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 中国古代青铜器 整理与研究

张懋镕 主编

青  
铜  
簋  
卷

任雪莉 著

科学出版社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张懋镕 主编

#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 青铜簋卷

任雪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 青铜簋卷 / 张懋镛主编; 任雪莉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1

陕西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ISBN 978-7-03-050752-5

I. ①中… II. ①张… ②任… III. ①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  
IV. ①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4385号

责任编辑: 李 茜 / 责任校对: 邹慧卿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年11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41 1/2 插页: 1

字数: 984 000

定价: 2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编写缘起

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工作，多卷本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即将出版。回顾往事，真是百感交集。

30年前，我的处女作《释“东”及与“东”有关之字》发表，从那时候起，青铜器的学习与研究注定成为我一生的追求。

29年前，我开始师从李学勤先生研习古文字。中国古文字有很多分支，如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文字。先生告诉我：“你在陕西，陕西有很多青铜器，你就做金文研究吧。”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令我终生受益。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周原出土西周有铭青铜器综合研究》。所谓综合研究，就是从青铜器、古文字、历史文献三方面来研究。从此综合研究成为我研究青铜器遵循的准则与方法。

1989年，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成立新的专业——博物馆专业，大概考虑到我本科学的是考古，于是把我从文献专业调到博物馆专业。除了继续讲古文字，又开了一门新课“青铜器鉴定”。自此之后，我开始系统研习青铜器，包括没有铭文的青铜器。

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我渐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有了新的认识。

概而言之，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自两宋以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百年来研究，在青铜器的分期、分区系、分国别、分器类诸方面卓有成效，为世人所瞩目。

回顾历史，也毋庸讳言，我认为就青铜器基础性工作而言，其资料的整理还远远不够。且提一个最基本也是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究竟有多少件中国古代青铜容器？（尚且没有涉及兵器、工具、车马器、钱币、铜镜等）几万还是十几万，恐怕连一个非常粗略的估计都没有，专家也说不清楚。家底不清，研究对象模糊，研究很难继续深入。由于中国古代青铜器资料十分庞杂，其收集、整理并非易事，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非常重要。说到研究，比如青铜器的定名，鼎、鬲、簋等各类器物的分类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各类纹饰的分类研究，纹饰和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铭文的特点，器物、纹饰、铭文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对断代的作用等等，其研究或不够系统，或不够深入，有些方面甚至是空白。

20多年来，我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写了《西周方座簋研究》《两周青铜盥研究》《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青铜器自名现象的另类价值》等文章，希望从器类、断代、地域、定名等多个角度

和层面对青铜器进行探索。

同时我也十分关注国内外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成果，他们的论著是我案头的必备书籍，我经常地反复阅读，受益无穷。

在研究中，我深感个人力量的有限。从1999年招收青铜器方向研究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构想：如果研究生本人没有更好的研究题目，我就请他来作青铜器中的某一部分，整理、研究某一类青铜器，或某一类纹饰，或某一时段的铭文，等等。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已经完成了20多篇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其中分器类的整理与研究完成多半，某一地区、某一时段的铜器的整理与研究正在进行，纹饰与铭文的分类、分时段研究也做了一部分。这些为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编撰奠定了基础。同时，我注意到其他先生也在指导研究生做类似的学位论文，对我们也很有启发与帮助。

前几年，在编写《青铜器论文索引》的过程中，与北京线装书局的刘聪建先生多有接触。他听了我的上述介绍后，很感兴趣，遂与我商定，在原有研究生论文的基础上，由我主编，各专题作者分别著述，形成一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线装书局只出了三卷。如今，在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计划得以重新实现，拟在今后的若干年里，陆续完成和出版20卷以上的著作。

写作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目的拟在全面、系统整理青铜器资料，充分吸取古今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组合关系等方面作全方位考察和研究，并试图总结出关于中国古代青铜器产生、发展、消亡的基本途径、规律、特点及其原因。这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我们有信心一步一步地走近它。

由于这套多卷本《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的作者都是毕业不久的研究生，眼界有限、文字青涩也在所难免。我的指导也很有限，很多问题我也不懂或知之甚少。当时作学位论文时，我希望他们放大胆子去写，因此他们的观点与我也不尽一致。但无论如何，在阅读他们的学位论文时，在与他们的反复讨论、交流中，我也有很多的收获，这是最令人快乐的事情。我将阅读后的感想写出来，作为序言放在书前，就是希望继续与大家讨论，将《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延续下去。而随着一本本书稿的出版，这一批年轻的作者也正在走向成熟，这或许是比书稿的出版更有意义的事情。

最后要感谢参加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审阅论文的诸位先生，并希望今后继续得到你们的批评与帮助。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暨历史文化学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科学出版社李茜编辑的辛勤工作，让我们十几年来梦想终于得以实现。

乙未年立冬后二日张懋镕写于  
陕西师范大学中国青铜文化研究中心

# 青铜簋：仿陶青铜器器类演进的典型代表（代序）

张懋镕

青铜簋是除青铜鼎之外，数量最多、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的一类器物。青铜簋仿自陶簋，作为一种仿陶青铜器，它何以能超越其他盛食器，经久不衰？任雪莉博士的《青铜簋卷》为青铜簋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sup>①</sup>，本文拟进一步讨论青铜簋演进的基本轨迹及其原因。

## 一、相生关系是青铜簋演进的重要推手

青铜簋来源于陶簋，这是考古界的共识，无需多说。问题是在青铜簋的演进过程中，陶簋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

不妨先来看看《青铜簋卷》对青铜簋的型式划分。共分三大类：甲类圈足簋，乙类方座簋，丙类附足簋。在这三大类中，只有甲类圈足簋与陶簋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乙类方座簋和丙类附足簋都是从甲类簋中演化而来的，与陶簋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便是甲类圈足簋，其中也只有A型的碗形簋和B型的孟形簋与陶簋相似，其他如C型的罐形簋、D型的豆形簋，已经与陶簋有了相当的距离。即便是A型的碗形簋和B型的孟形簋，其中也只有Aa型的无耳簋和Ba的无耳簋与陶簋接近，作为Ab型的环耳簋和Bb型的环耳簋在陶簋中很少能见到它的影子，至于Ac型的附耳簋和Bc型的附耳簋都与陶簋有很大差别，除非是仿铜的陶簋。换言之，在青铜簋出现不久的商代，簋的数量有限，型式也不多，刚开始出现的簋是甲A型碗形簋，其中以甲Aa型碗形无耳圈足簋与陶簋最接近。显然，在型式方面，尽管陶簋孕育了青铜簋，但是并没有给青铜簋的发展提供多少样板。

《青铜簋卷》对各类青铜簋的数量有一个统计。甲类圈足簋1235件，其中A型碗形簋共769件，甲Aa型碗形无耳圈足簋112件。甲B型孟形簋213件，Ba型的无耳簋144件。甲C型罐形簋179件，甲D型豆形簋54件。乙类方座簋202件，丙类附足簋615件。总计参与型式分析的青铜簋2052件。与陶簋有直接传承关系的甲Aa型碗形无耳圈足簋

<sup>①</sup> 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青铜簋卷》，以下简称《青铜簋卷》，本文凡涉及该书的引文，不再一一注明。

112件，Ba型孟形无耳圈足簋144件，仅占总数的12.47%，这意味着大部分青铜簋的造型与陶簋没有什么关系。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陶簋对于青铜簋的产生虽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对于青铜簋的发展所起的影响则是很有限的。

如果按照器物惯性发展下去，似乎青铜簋就只有碗形无耳圈足簋和孟形无耳圈足簋这两个亚型，如何能成就青铜簋的辉煌？我们都知道，进入西周以后，青铜簋的新型式纷纷出现，最初是方座簋、四耳簋、四足簋，中期以后更有圈足簋、附耳簋、衔环耳簋、贯耳簋、豆形簋等。簋的发展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相生关系。当青铜簋一旦成为青铜礼器组合中的重要成员，就意味着它逐渐脱离了陶簋的束缚，与陶簋分道扬镳，开始与其他青铜器相适应，建立自己的发展系统。

十年前，我们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以下简称《关系》）<sup>①</sup>，并归纳出器类之间的三种关系：派生关系、相生关系、更替关系。我们首先解释了什么是相生关系：相生关系是指两类不同的青铜器在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形成一定的组合关系，因用途、功能相近的缘故，相互吸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种在形制上介乎二者之间的新品种。例如鼎、鬲相生出分裆鼎，鼎、簋相生出蹄足敦，鼎、盨相生出鼎形盨，孟、簋相生出孟形簋，簋、豆相生出簋形豆和豆形簋等。接着，我们谈了研究相生关系的意义。第一，相生关系产生了一批新品种、新形态，如分裆鼎、蹄足敦、觚形尊。第二，有助于了解器物形态产生的原因和变化的轨迹。第三，有利于器物的定名。其中第一点和第二点表明在青铜器的产生和演进过程中，相生关系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要说的是相生关系对簋的发展意义尤为重大。下面试做论证。

### 1. 首先给青铜簋带来发展契机的是方座簋

商人对青铜器的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青铜鼎在青铜器组合关系中的核心地位。周人对青铜器的贡献在于确立了青铜簋与青铜鼎的匹配地位。在商代，簋的数量有限，而且簋类器中始终缺乏大器。此时的青铜簋又小又矮，通高大部分在20厘米以下，口径不过20厘米左右，如果将它与鼎配置，有点不相称。这一局面，在西周早期有了改观，其标志是方座簋的出现。

在青铜方座簋出现之前，所有陶簋都不带有方座。方座簋的产生很可能与西周早期青铜禁的出现有关，也可能受到其他方形器的影响，是青铜簋与包括青铜禁在内的方形器相互影响的产物<sup>②</sup>。

<sup>①</sup> 张懋镛：《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5页。

<sup>②</sup> 张懋镛：《西周方座簋研究》，《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88~97页；《再论西周方座簋》，《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98~111页；《三论西周方座簋》，《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106~109页。

西周早期方座簋的出现，可以说第一次改变了人们对青铜簋的印象。《青铜簋卷》收录方座簋202件，占总数的9.84%，数量相当可观。引人注目的是方座簋的质量。方座簋绝大部分通高在20厘米以上，有近乎三分之一通高在30厘米以上，而且分量很重。如强伯方座簋通高38.7厘米，重13.45千克（《商周》04294）（图1）；宰兽簋通高37.5厘米，重14.4千克；追簋通高38.6厘米，重18.9千克（《商周》05251-56）。更有59厘米高的厉王鞮簋，重60千克（图2）（《商周》05372）<sup>①</sup>。而且方座簋大多铸造精良，纹饰繁缛，有五分之四的方座簋是满花器，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还有四耳的方座簋，形制奇特，做工精良。其主人有强伯、鄂叔、大保、宜侯、邢侯等，多为诸侯与王朝重臣。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方座簋有铭文。著名者有大丰簋、利簋（图3）、德簋、格伯簋等。迄今为止铭文最长的簋是牧簋（《商周》05403），221字，它就是一件方座簋。方座簋有时成套出现，譬如宰兽簋4件一组（《商周》05376-77），疾簋更是8件一组（《商周》05189-96）。试想8件35厘米以上的疾簋同时出现，场面该何等宏伟（图4）！方座簋通常出土于较大的墓葬中，如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山西侯马晋侯墓地、陕西宝鸡强国墓地、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为高级贵



图1 强伯方座簋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资料）



图2 鞮簋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资料）



图3 利簋  
（《全集》五，49）



图4 疾簋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资料）

<sup>①</sup>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本文简称《商周》。



族所用。这些都是一般的簋无法企及的。可见方座簋的出现，弥补了一般青铜簋的不足，提升了青铜簋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地位，满足了高级贵族乃至周天子的需要。



图5 曾侯乙簋  
(《曾侯乙墓》图版五八, 1)

即便在春秋中期之后，青铜簋的发展空间受到青铜敦、簠、豆的挤压，开始走下坡路时，一般的青铜簋数量很少，而方座簋仍然占据重要位置。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8件蔡侯申簋（《商周》04393-4400），通高36.5厘米，重7.2千克，年代为春秋晚期<sup>①</sup>。1936年河南辉县琉璃阁甲墓出土6件无耳方座簋，年代在春秋中晚期之交<sup>②</sup>。湖北随州擂鼓墩一号墓出土8件曾侯乙方座簋（《商周》04473-80），通高31.8厘米，重12.8千克（图5），年代在战国早中期<sup>③</sup>。方座簋依然体量超常，是诸侯国君的青睐之物，是其地位、身份的标志。

方座簋的年代从西周早期一直持续到战国中晚期，流行区域从陕西宝鸡地区到中原大地，后来又遍及长江南北，可以说方座簋一直在延续着青铜簋的辉煌。大概只有方座簋这样宏大的簋形器，才能压住其他饪食器的发展势头，即使在不景气的东周时期，也多少为青铜簋挣得一点空间。

## 2. 孟形簋、豆形簋将簋的发展推向高潮

如《青铜簋卷》所言，西周早期是青铜簋发展的鼎盛期，那么青铜簋是如何登上高峰的？除了方座簋，还有两种型式的簋——孟形簋和豆形簋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孟形簋，即《青铜簋卷》所分甲B型簋。孟形簋是在孟和簋相互影响下产生的新品种。孟形簋的流行时间不长，自商代晚期始出，主要见于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据《青铜簋卷》统计，孟形簋计213件，约占圈足簋数量的18%，数量超过方座簋。



图6 乳钉纹簋  
(《考古》1958.10, 图版二, 3)

孟形簋中以Ba型无耳簋数量居多，约144件。前面谈到，Ba型无耳簋可能与陶簋有关，但也可能与孟的关系更大一些。因为孟形无耳簋多见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此时距离青铜器模仿陶器的初级阶段已很遥远。孟形无耳簋虽然比孟小，但与同时期Aa型簋相比，普遍要大一些，通高绝大部分在15厘米以上，而大部分Aa型簋通高在15厘米以下。Ba型无耳簋有一些超过25厘米，譬如《青铜簋卷》附表序号772的乳钉纹簋，高26、口径25厘米（图6），序号862尖

① 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4、17页。

② 河南省博物院、台北历史博物馆：《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21页。

③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208、209页。

刺乳钉纹簋，高26.5、口径24.6厘米。Ba型无耳簋比较厚重，多有纹饰（以乳钉纹为多），有的还装饰有扉棱，在早期簋类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青铜簋卷》所分甲Bb型簋是一种孟形环耳圈足簋，共48件，数量也不少。也有部分器物尺寸较大，如《青铜簋卷》附表序号915双耳簋（图7），高23、口径33.5厘米<sup>①</sup>。其中有一种四耳簋，引人注目。如纸坊头M1出土的四耳簋，高23.8、口径26.8厘米，重8.4千克<sup>②</sup>（图8）。此器装饰华丽，典雅大方。石鼓山出土的四耳簋高30、口径34.6厘米，重18.35千克（图9）。这大概是孟形簋中最重的一件<sup>③</sup>。戴家湾出土的四耳簋高23.2、宽36.5厘米<sup>④</sup>。这些四耳簋不仅体量大，而且造型独特，装饰别致，每一件都是青铜器中的珍品。

《青铜簋卷》所分甲Bc型簋是一种孟形附耳簋，形制十分像孟，但正如陈梦家所言：“簋、孟之别恐在大小，孟通常较大。”<sup>⑤</sup>这种型式的簋最像孟，因此不少论著将其与孟混淆。林巳奈夫在《综览》中就称其为小型孟。孟形附耳簋的年代绝大部分在西周，因为此时簋形器很活跃，在积极发展的同时，想方设法借鉴其他的器物，而此时的孟，也从高大变得比较横宽，形态靠近铜簋，二者相互影响，产生这种孟形附耳簋<sup>⑥</sup>。

甲Bc型附耳簋有21件，数量不多，但很有特点，首先是所有附耳簋都有纹饰，其次大部分附耳簋有铭文，铭文最长的是虢簋（《商周》05295）（图10），有72字，年、月、日、干支四要素俱全，是穆王时的标准器，这对于历史研究有重要意义<sup>⑦</sup>。《青铜簋卷》附表序号973滋簋，通高24.5、口径23厘米，序号981命簋，通高24.1、口径21.6厘米，在西周时期也算的上比较大的器物了。

豆形簋，即《青铜簋卷》所分甲D型簋。豆形簋有54件，流行时间不长，自商代晚期始出，主要见于西周时期，其中以西周早期为多，有19件，与周人重食文化有关。豆形簋是两种盛食器豆和簋相互影响下产生的新品种。虽然它有点像豆，但稍加

① 一件传世的祖丁簋，陈梦家在《美集录》（A193）中记载其通高35.7、口径22.8厘米，但是从图像来看，口径明明大于通高，所以很怀疑其记载的准确性。

② 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强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35页。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宝鸡石鼓山商周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1期，28页。

④ 任雪莉：《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戴家湾卷》，科学出版社，2015年，39页。

⑤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

⑥ 张懋镛：《论孟形簋》，《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⑦ 张懋镛：《新见金文与穆王铜器断代》，《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95~97页。



图7 妇好墓双耳簋  
(《殷虚妇好墓》图版一七,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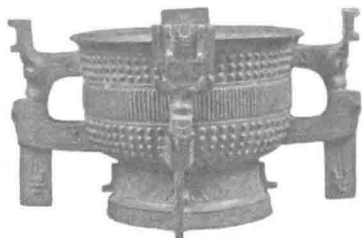


图8 四耳簋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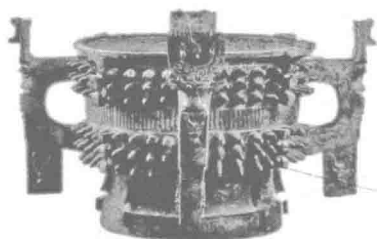


图9 石鼓山四耳簋  
(《文物》2016.1, 封三, 1)



图10 斲簋  
(《文博》2013.2, 20页, 图七)

分析,它更接近簋<sup>①</sup>。有相当一部分豆形簋很有特色,一是体量稍大,二是形制奇特。1959年吕梁石楼桃花庄出土铜簋,高26、口径33.5厘米,1962年清涧解家沟出土铜簋,高27.3、口径28厘米,是豆形簋中的大型器物。在豆形簋中,数三耳簋极为稀有,迄今只发现两件,均以豆形簋的形制出现。一件是巴黎色努施奇博物馆藏的史簋,高16.5、口径30厘米(指两耳间距)。一件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高19.1、口径30.5厘米。在簋类器中,四耳簋也很少,且多以豆形簋的形制出现,至少有12件。如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出土的子四耳簋两件,高13.3~14.4、口径20~20.2厘米,重3~3.4千克。虽然尺寸



图11 宜侯矢簋铭  
(《全集》六, 118)

不是很大,但很重,可见其厚重程度。1954江苏镇江丹徒出土宜侯矢簋一件,高15.7、口径22.5厘米。宜侯矢簋有铭文126字,是西周早期最长的青铜簋铭文,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图11)。传世的太保簋一件,高23.5、口径37.5厘米(指两耳间距),荣簋,高14.8、口径20.6厘米,也是四耳簋。长子口、宜侯矢都是诸侯国的国君,太保是鼎鼎有名的召公奭,荣是朝廷大臣、周王的叔父,地位都很高,由此可见四耳簋的价值。

① 张懋镛:《关于青铜器定名的几点思考——从伯湄父簋的定名谈起》,《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三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139~145页。

### 3. 附足簋助推簋的持续发展

《青铜簋卷》认为以大甸子墓地为代表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附足容器，有可能是青铜附足簋最早的图范来源。我们认为从青铜器的发展演化史来看，附足簋更有可能是簋与鼎相生的产物。

所谓附足簋就是在簋的外底或圈足下增加三足或四足，借以提高簋体的高度，与方座簋在圈足下增加一个方座，有异曲同工之妙。附足簋即《青铜簋卷》所分的丙类簋。附足簋之所以重要，首先是数量多。据《青铜簋卷》统计有615件，比方座簋、孟形簋、豆形簋三者的总和469件还要多。其次，附足簋的型式也很丰富，《青铜簋卷》划分A、B、C、D四个类型。其中Cb型划分为六式，从西周中期偏早到春秋早期偏晚。正如《青铜簋卷》所言：西周中期后段至西周晚期，附足簋“取代了普通的圈足簋，一跃成为簋的主流型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非常值得关注。

附足簋的高度和重量也引人注目。在青铜簋中，除了方座簋，要数附足簋大气。通高超过25厘米的附足簋有：

#### （1）西周早期

1974年北京琉璃河M53出土的攸簋，有盖，通高28.5厘米，重4.21千克（《商周》04813）。

琉璃河M209出土的乙公簋，有盖，通高28.2厘米，重4.96千克（《商周》04257）（图12）。

臣辰父乙簋，有盖，通高25.6厘米（《商周》04215）。

#### （2）西周中期

1984~1989年天马一曲村M7113出土的伯簋，有盖，通高25厘米，重3.51千克（《商周》03884）。

1993年晋侯墓地M31出土的2件瓦楞纹簋，通高26厘米。

196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窖藏出土4件元年师旅簋，有盖，通高25.6厘米（《商周》05331-34）。

1972年陕西周至下仓峪出土的太师簋，有盖，通高32厘米（《商周》04452）。

1974年陕西周至城关出土的王作姜氏簋，有盖，通高25厘米，重5.5千克（《商周》04289）。

1959年陕西蓝田寺坡村出土弭叔师察簋2件，有盖，通高26.6厘米，重7.75千克（《商周》05291-92）。

1986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95出土敌簋4件，有盖，通高26厘米（《商周》05072-73）。



图12 乙公簋  
（《琉璃河》彩版一七）

传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应侯见工簋，有盖，通高25.5厘米，重7千克（《商周》05231）。

### （3）西周晚期

芮公簋2件，有盖，通高26.7、28.5厘米（《商周》04825-26）。

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此簋一套8件，有盖者通高23.8~25.7厘米，4.93~6.15千克（《商周》05354-61）。

1967年陕西永寿出土仲相父簋2件，有盖，通高25.5~26厘米，重7.66~8千克（《商周》05156-57）。

陕西长安马王镇出土太师小子簋3件，有盖，通高25厘米，重6.5~7.7千克（《商周》05123-25）。

1995年河南三门峡李家窑出土追夷簋2件，有盖，通高25.6厘米（《商周》05222-23）。

叔向父簋8件，有盖，通高25~25.6厘米，重8.42千克（《商周》04792-99）。

郑虢仲簋2件，有盖，通高25厘米，重5.5千克（《商周》04995-96）。

梁其簋5件，有盖者通高25.6厘米，重6.68千克（《商周》05161-65）。

1972年湖北随县熊家老湾出土曾仲大父蚠簋2件，有盖，通高26、27厘米，重6、7.2千克（《商周》05228-29）。

1980年山东滕县后荆沟出土不斲簋，有盖，通高26厘米，重8.5千克（《商周》05387）。

2001年山东姑子坪出土的窃曲纹簋2件，有盖，通高27.3厘米。

史颂簋，有盖，通高26.9厘米，重9.35千克（《商周》05259）（图13）。

师寰簋，有盖，通高27厘米，重9.18千克（《商周》05366）。

颂簋，有盖，通高30.1厘米，重13.2千克（《商周》05390）。

毛伯鬻父簋，有盖，通高25.8厘米，重6.09千克（《商周》04970）。

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鼃乎簋2件，有盖，通高24.6、25.2厘米，重5.4千克（《商周》05152）。

### （4）春秋早期

1974年湖北随县尚店出土郢公伯簋2件，有盖，通高25.2厘米，重5.8千克（《商周》04980-81）。

1970年山东历城北草沟出土鲁伯大父簋，有盖，通高25.4厘米，重5.28千克（《商周》04863）。

杞伯每刃簋，有盖，通高25厘米，重8千克（《商周》04855）。

瓦楞纹簋，有盖，通高27.2厘米（《美集录》A247）。

昶伯簋2件，有盖，通高27厘米（《商周》04893）。

### （5）春秋晚期

河南新郑郑公大墓出土窃曲纹簋8件，有盖者高26~27.5厘米。

1978年河南浙川下寺M1出土蟠螭纹簋，有盖，高28厘米。

浙川下寺M2出土郝子佃簋2件，有盖，通高30.5厘米，重16千克（《商周》04578）（图14）。



图13 史颂簋  
（《商周》052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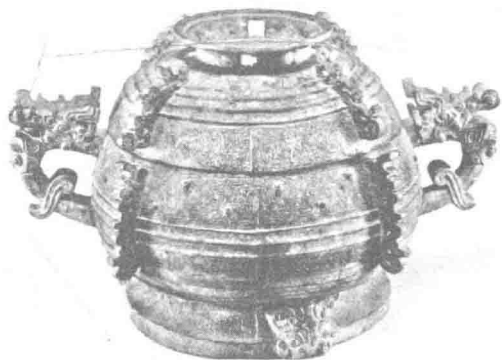


图14 郝子佃簋  
（《商周》04578）

之所以罗列以上这么多例子，是要说明以下七点：

第一，较大型的附足簋在西周早期数量少，中期增多，晚期达到高峰，进入春秋之后又逐渐减少，这与一般附足簋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

第二，一般的圈足簋，高度在20厘米以下，甚至低于15厘米，重量不过1、2千克，而附足簋的高度和重量则大大超过一般的圈足簋。以上例子显示出附足簋在高度和重量上的优势，这正是包括附足簋在内的青铜簋在西周中晚期依然能有所发展的原因所在。

第三，以上器物的主人不是国君就是大臣，说明附足簋受到当时社会各个贵族阶层特别是统治阶层的青睐。

第四，以上器物不少是成对成组出现，最多达8件一组，有利于与同墓出土的青铜鼎相配置，形成西周特有的鼎簋制度。

第五，前面我们已经说到附足簋是簋与鼎相生的产物，证明附足簋与鼎有密切关系，而附足簋在西周中晚期的发展，正是西周特有的鼎簋制度形成并且完善的阶段，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附足簋在西周中晚期可以大放光彩。

第六，附足簋的高度和重量虽然不及方座簋，但也差别不大，这就解释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方座簋从西周早期出现，并在西周早期已经攀上高峰，反而在西周中晚期数量有所减少，原来是附足簋挤占了它的发展空间。从方形器的价值可知，铸造一个方座簋毕竟比铸造附足簋要困难。方座簋气势宏大，但并不很实用，在西周中晚期用

附足簋部分替代方座簋显然是一种明智的策略。

第七，以上器物绝大部分有铭文，甚至铭文很长。这一点可能为人所忽视，就是附足簋上的铭文最多。从《商周》著录的金文来看，100字以上的铭文的青铜器序号从05336到05403，除去没有器身图像的20件，还有48件。其中圈足簋9件、附足簋29件、方座簋7件、豆形簋2件、特殊形簋1件。附足簋占总数的60.42%，有绝对优势。大量长篇铭文铸造在附足簋上，足见时人对附足簋的重视。显然附足簋的发展对于整个青铜簋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青铜簋卷》的统计数据来看，西周早期的青铜簋数量最多，达582件，型式也最丰富，而西周中期要差一些，有317件，到了西周晚期的数量有所回升，为369件。不过要是从附足簋及其铭文所包含的重要信息来看，西周中晚期依然是青铜簋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阶段。

综上所述，青铜簋虽然仿自于陶簋，但陶簋的型式毕竟有限，在青铜簋的发展初期，吸收陶簋的养分，似乎还能维持。但随着青铜器组合形式的复杂化，仅有的几种样式已经不能满足礼制的需要，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种途径是另起炉灶，创造新的器类，以适应礼制的呼唤，然而这样做不仅需要全新的构想，而且需要很长的试验阶段。另一种途径就是借鉴，借鉴其他器类的特点，采用局部移花接木的办法，改变原有器类的面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相生关系出现的缘由。相生关系产生的方座簋、孟形簋、豆形簋、附足簋从西周早期一直活跃到春秋中期，这一阶段正是青铜簋发展的黄金时期，春秋中期之后，再不见有什么因相生关系产生的新的型式的簋了，青铜簋也就开始走向衰落。

## 二、派生关系催生庞大的簋类器

我们在《关系》一文中<sup>①</sup>，指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的产生，包括簋在内的鼎、鬲、甗、豆、爵、觚、杯、盘、盆、孟等大部分器类乃模仿陶器而来，但也有一部分器类如盨、簠、敦是在簋的基础上衍生演化出来的，我们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称之为派生关系。从簋派生出簠、盨、敦，对簋的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产生了新的器种，延续了簋的生命。如前所言，青铜簋在西周早期步入兴盛时期，中期之后簋的发展速度减缓，正是在这个紧要关头，簋的派生物簠和盨相继出现，给饪食器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春秋早期之后簋不再是饪食器的主角，作为簋的继承者，青铜敦异军突起，与簠相伯仲，成为春秋战国饪食器的主导者。

第二，增强了盛食器的实力。盨在初现时未有新名，暂且使用派生物簠的名字。

<sup>①</sup> 张懋谔：《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器类之间的关系》，《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3~135页。

年代稍早的盥，常自名为簠。如伯鲜盥：“伯鲜作旅簠。”（《商周》05528-31）伯庶父盥盖：“伯庶父作盥簠。”（《商周》05600）在当时人们眼中，盥还是属于簠类器，这自然增加了簠的实力。簠和盥不同于簠的一点是体量通常要大于簠，它们只出现在中級以上的贵族墓葬中，这无疑提升了簠类器在青铜礼器组合中的地位。

同时，我们也看到，青铜簠的演进模式对派生物盥、簠、敦等饪食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面我们说到附足簠初现于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晚期和春秋时期，取代普通的圈足簠，成为簠的主流型式。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值得关注。那么在青铜簠上发生的这种演变，仅仅存在簠上吗？在夏商周青铜盛食器盥、盆、孟、敦、簠的演化过程中，会看到一个基本规律：从开始的平底器，或者圈足器，渐渐变为三足（或四足）器。尽管它们之间形态千差万别，功能也不一样，但这种变化却惊人地一致。

先说盥。我们在《两周青铜盥研究》一文中指出<sup>①</sup>：最早出现的是应侯再盥（图15），这是一种圈足盥，和最先出现的圈足簠很接近，所以我们认为盥来自于簠，盥是簠的派生物。应侯再盥的年代大致在共王时期，可见盥在初现时并没有附足。而后出现缺口圈足盥，与圈足盥的差别在于圈足的短边与长边的中间出现缺口。缺口将圈足分割成四块，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就像四个粗大的足，相当于短足的附足簠。代表器物是克盥（图16）、伯宽父盥，年代已到厉宣时期。还有一种型式的盥是圈足下设置四足，如晋侯对盥。有一种型式的盥没有圈足，四足直接连在盥的外底，看起来像鼎，如召伯虎盥、矢曷盥（图17）。有学者据此以为盥来源于鼎，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这类盥的形制像鼎，只是表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鼎的影响罢了。总体而言，真正的圈足盥只占少数，主流型式是有缺口的圈足盥和附足盥，由圈足盥发展到缺口的圈足盥再到附足盥。附足盥晚于圈足簠，显然，盥在复制簠的演化模式，和青铜簠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图15 应侯再盥  
（《商周》05639）



图16 善夫克盥  
（《商周》05678）



图17 矢曷盥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资料）

还有簠。我们已经著文论说过，与盥一样，青铜簠也是簠的派生物，所以巧得很，青铜簠的足部演化轨迹与青铜盥非常相似。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青铜簠出自陕西

<sup>①</sup> 张懋镛：《两周青铜盥研究》，《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科学出版社，2006年，135页。



宝鸡石鼓山M4<sup>①</sup>（图18）。其圈足形态与最早的青铜盥一样，呈封闭状。相似的器物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夔纹簋。这几件簋的年代在西周早期。直到西周中期的史免簋（《商周》05909），圈足的状态依然没有变化。有趣的是进入西周晚期后，簋的圈足的中部开始出现长方形或果叶形缺口，与同时期盥的圈足缺口一样，如函交仲簋（《商周》05788）（图19）、虢叔簋（《商周》05813-14）。到了春秋战国，圈足的缺口越来越大，原先所谓的圈足，看起来与四足差不多。典型器物如蔡侯申簋（《商周》05775）、中山国墓葬出土的左使车簋（《商周》05761-62）、楚王畀簋（《商周》05842-44）。极端的做法如陈曼簋（《商周》05923-24）（图20），圈足缺口无限大，留下的部分已经与一般的器足没有什么区别了。还有一种型式的簋，器底下不接圈足，直接四短足，如猷叔簋（《商周》05858）、京叔姬簋（《商周》05800）。可见，簋的演变也遵循从圈足到附足的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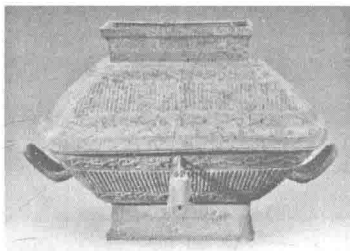


图18 石鼓山铜簋  
（《文物》2016.1，图三三）



图19 函交仲簋  
（《商周》05788）



图20 陈曼簋  
（《商周》05924）

再谈敦。最早出现的是平底敦，如洛阳中州路M2415：7敦，与簋很相似，以至于相互混淆，时间在春秋中期早段。相近的器物还有1976年湖北随县出土的息子行敦（《商周》06262）、河北唐县出土的归父敦（《商周》06066）（图21）。而后出现所谓盞式敦，在平底下伸出三小足。如楚王畀盞（《商周》06056）（图22）、黄子婁盞（《商周续编》0523），以上两器年代均在春秋晚期，可见有足敦要晚于平底敦。至于标准的青铜敦即球形敦，与同时期鼎非常接近，俗称“西瓜鼎”，如昭之王孙即盞<sup>②</sup>（《商周续编》0525）。有的下腹有三蹄足，足较长，如矚于噉盞（《商周》06059）（图23），年代较晚，多数在春秋晚期偏晚和战国时期。在敦中，平底敦较少，多数是上述的盞式敦和球形敦。由此可见，敦的发展也是先有平底，再向有足器过渡。

不仅簋的派生物与簋有相似的演进轨迹，其他饪食器如盆、孟也受到簋的影响，具有类似的演化痕迹，只是没有盥、敦、簋那么明显。

① 张懋镛：《青铜簋兴起于宝鸡说》，《文博》2015年第1期。

②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本文简称《商周续编》。